

· 专题论文 ·

# 美国学术界关于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的研究

陶季邑

(暨南大学 社会科学部, 广州 510632)

**摘要:** 冷战时期,美国学术界对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的起因、过程、性质和影响均作了一定的研究。而冷战结束后,随着新资料的不断挖掘,美国学术界对这些问题则作了更全面更深入的研究,学者们除坚持冷战时期的一些看法以外,还提出一些新观点,或作了一些新分析,从而使得后冷战时期美国学术界在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的研究方面取得一些新进展。美国学术界的这些探讨对当今中国学者进一步研究这一课题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美国 中国 苏联 珍宝岛冲突 冷战时期 后冷战时期

**中图分类号:** K153; E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3451(2016)06-0105-12

## American Academia's Research on Sino-Soviet Armed Conflicts over Zhenbao Island

Tao Jiye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Abstract:** During the Cold War, US academic circles conducted some research on the causes, the process, the nature and the impacts of the Sino-Soviet armed clashes over Zhenbao Island.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merican academia have carried out more in-depth and comprehensive research on those aspects as new materials are being found. They continue to hold their opinions formed during the Cold War; besides, they have advanced some new ideas and made some new analyses. Therefore, US academic circles, in this post-cold war era, have made some new progress in the study of the Sino-Soviet armed clashes concerning Zhenbao Island, and their discussion can expect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Chinese scholars today in making further research on this topic.

**Key words:**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USA); China; the Soviet Union; conflicts over Zhenbao Island; during the Cold War; post-cold war era

1969年3月2日至17日,中苏在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发生了武装冲突,这对以后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起到了促进作用。

从20世纪六十年代末起,美国学术界对此冲突展开研究,一些涉及该问题的专著陆续问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托马斯·鲁宾逊的《中苏边界争端:背景、发展与1969年3月的冲突》(兰德公司,1970年)和《边界谈判与中苏美关系的未来》(兰德公司,1971年)、哈罗德·辛顿的《熊在门口:中国在苏联压力下制定政策》(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1971年)、安泰笋的《中苏领土争端》(威斯特明斯特出版社,1973年)、威廉·格里菲思主编的《世界与大国三角》(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75年)、罗伯特·萨特的《文化大革命发生后的中国外交政策:1966—1977年》(维斯特威沃出版社,1978年)、李侃如的《20世纪70年代的中苏冲突:它的演变和对战略三角的意义》

作者简介:陶季邑,暨南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兰德公司,1978年)、理查德·维奇的《中苏危机政治:政治变化和交往研究》(哈佛大学东亚研究理事会,1980年)、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哈珀与罗出版公司,1980年)、梅尔·格托夫和韩国学者黄秉沫的《处于威胁之中的中国:战略政治和外交》(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80年)、高龙江的《中国决定与美国和解:1968—1971年》(维斯特威沃出版社,1982年)、哈里·格尔曼的《苏联远东的集结与反华冒险》(兰德公司,1982年)、乔纳森·波拉克的《中苏敌对与中国安全争论》(兰德公司,1982年)、赫伯特·埃利森主编的《中苏冲突:从全球观点看问题》(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82年)、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剑桥大学出版社,1991年),等等。此外,还有一些相关论文和研究报告。如兰德公司研究员艾伦·怀廷1969年8月16日为基辛格撰写的题为《中苏敌对及其对美国的启示》的长篇研究报告。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俄罗斯、美国和德国等国又先后出版一些有关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的研究资料尤其是解密的档案文献和当事人回忆录。结合这些新资料和新成果,美国学术界继续探讨这一问题,又推出一批相关著作。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罗德明的《中苏关系正常化及其国际影响:1945—1990年》(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92年)、约翰·伽夫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普伦蒂斯·霍尔出版社,1993年)、陆伯彬的《解决合作问题:美国与中国,1969—1989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5年)、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的《中国政治:毛泽东和邓小平时期》(剑桥大学出版社,1997年)、帕特里克·泰勒的《长城》(公共事务出版社,1999年)、詹姆斯·曼的《关于面子:美国与中国奇怪的关系史——从尼克松到克林顿》(阿尔弗雷德·瑞弗出版社,1999年)、约翰·塞克斯顿和艾伦·亨特的《当代中国》(圣马丁出版社,1999年)、翟强的《中国与越战:1950—1975年》(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2000年)、兰德公司高级研究员马克·布勒斯和阿布拉姆·舒斯克的《中国动武方式:来自历史和理论著作中的证据》(兰德公司,2000年)、陈兼的《毛的中国与冷战》(北卡罗来纳出版社,2001年)、马克·瑞安、冯德威和迈克尔·麦德伟主编的《中国作战:1949年以来人民解放军的经历》(夏普出版社,2003年)、江忆恩和陆伯彬主编的《中国外交政策研究中的新倾向》(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6年)、李小兵的《现代中国军队史》(肯特基大学出版社,2007年)、余科诺里·克密纳的《美国外交政策秘密:尼克松、基辛格与对华和解》(阿什盖特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克里斯托夫·福特的《帝国的头脑:中国的历史和现代外交关系》(肯特基大学出版社,2010年)、李小兵主编的《交战中的中国:百科全书》(美国书目中心—克利欧出版社,2012年)、罗伯特·萨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1949年以来中国国际政治的遗产和局限》(罗曼·利特尔菲尔德出版社,2013年),等等。此外,还有一些相关的论文和研究报告。其中,斯坦福大学政治系博士研究生泰勒·弗莱维尔于2003年完成的博士论文《通往和平的长征:解释中国如何解决领土争端》最具代表性。

限于篇幅,本文以冷战和后冷战两个时期为分界,对美国学术界关于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的研究略作梳理。

## 一、关于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起因的研究

### (一) 冷战时期关于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起因的研究

冷战时期,美国学术界分别从中国、苏联的角度和中苏两国共同的角度对武装冲突的起因作了初步的考察。

1. 从中国的角度而言,美国学者认为大致有以下原因:

(1) 中国选择在1969年初与苏联发生流血冲突,也许是为了激发当时全国人民大众的热情。

托马斯·鲁宾逊指出：“到1968年末和1969年初”，“可能是北京派别斗争激烈”，“并形成僵局”。毛泽东也许认为，“要打破僵局”，消除党内派别斗争，“引发大众的热情”，最好的办法就是采取一种惊人之举，亦即“与苏联发生流血冲突”。<sup>①</sup>

(2) “文化大革命”初期极左思潮造成中国对外感情用事。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国与苏联发生武装冲突。费正清指出：“中国的对外关系在文化大革命中同样受到无意义的狂热影响。”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狂热思潮盛行。从1966年9月到1967年8月，对外关系中主观和感情用事的做法导致中国和好几个国家外交关系破裂。对外贸易数额骤减。国内混乱到连外国驻华机构也受影响。“文革的好斗在对外方面于1969年3月2日到了严重关头”，出现一场冲突，即中国边防军在珍宝岛同苏联边防军发生武装冲突。<sup>②</sup>

(3) 毛泽东的战略策略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国选择在珍宝岛与苏联发生武装冲突。威廉·惠特森和黄贞霞指出：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创立一套战略策略，如实行“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术的速决战”，即采用先发制人的谋略，“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正确选择作战对象、时间和地点，从而最有效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在苏军1968年8月侵入捷克斯洛伐克之后，中国开始作应对苏联军事威胁的准备。此时，苏联开始在中国东北边境地区进行军事集结，“毛主义的军事路线重新开始得到重视”。事实上，“毛主义的策略主要地用于中国境内的军事作战”，也适用于解决中苏边境冲突这类事件。所以，中国最终于1969年3月2日选择在位于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与苏联发生武装冲突。<sup>③</sup>

(4) 中国希望在国际上享有“大的独立性”。这推动中国逐渐离开苏联，最终发生中苏武装冲突。理查德·维奇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形成美苏两极格局。在这种国际体系里，新生的中国与苏联结盟，并没有“大的独立性”。但到195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主义阵营出现明显变化，“北京开始采取一些重要的行动，以摆脱这种两极体系，朝着更大的独立性方向发展”。“中苏危机”在此背景下发生并逐步升级。到1969年，危机达到顶点，在珍宝岛出现中苏武装冲突，“中苏同盟体系瓦解。”<sup>④</sup>

2. 从苏联的角度而言，美国学者认为大致有以下原因：

(1) 苏联国内政治对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的爆发有一定影响。托马斯·鲁宾逊指出：从1968年10月到1969年2月，“苏联领导人可能讨论过对华政策选择问题，并决定‘强硬’”。在此期间，苏联新闻媒体不断“批评”“文革”期间中国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维护苏联对华和其他地区的政策”，等等。或许，苏联军方在解决苏中边境问题所采取的好战态度超过苏共，也就是说，“苏联军方更好战”。这些“可能影响苏联对华的军事姿态和策略”，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苏中珍宝岛

<sup>①</sup>Thomas Robinson, *China confronts the Soviet Union: Warfare and Diplomacy on China's Inner Asian Frontiers*, in 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John K. Fairbank,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the People's Republic, 1966-198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262-263.

<sup>②</sup>John King Fairbank,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 New York: Perennial Library Harper & Row, 1987, pp.331-332.

<sup>③</sup>William W. Whitson and Zhenxia Huang, *The Chinese High Command: A History of Communist Military Politics, 1927-71*, New York: Praeger, 1973, pp.492-494, p.535.

<sup>④</sup>Richard Wich, *Sino-Soviet Crisis Politics: A Study of Political Change and Communication*, London: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0, pp.1-3, p.277.

武装冲突最终出现。<sup>①</sup>

(2) 苏军侵入捷克斯洛伐克对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的爆发也有一定影响。苏军侵入捷克斯洛伐克后,中国领导人担心苏联下一步将入侵中国,所以决定对苏联实施无情的斗争亦即军事打击,使苏联在大举进攻中国之前能稍微理智,不要对中国进行军事冒险。托马斯·鲁宾逊指出:1968年8月,苏军侵入捷克斯洛伐克,“极大地震撼了中国人”。“特别是勃列日涅夫用马列教条为苏联辩护,认为苏联有责任让原为共产主义的国家仍旧走共产主义道路。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种扩张主义。”中国现在担心,它自己将成为苏联军事打击名单上的下一个目标。中国的“这种担心”有助于中国在1969年初决定对苏联实施军事打击。在毛泽东看来,“只有无情的斗争才能打破苏联的平衡,才能让他们在进攻中国之前稍稍有些理智。”所以,1965年3月,“毛泽东和其同事决定,必须正面顶住咄咄逼人的苏军,以此警告苏联不要作进一步的军事冒险。”<sup>②</sup>

3. 从中苏两国共同的角度而言,珍宝岛事件是中苏边界长期冲突的继续。进入1960年代以后,中苏边界事件不断增加,边境局势日益紧张。这种状况发展下去最终导致珍宝岛事件的发生。托马斯·鲁宾逊指出:早在1959年,中苏就开始边界冲突。“1960年开始,边界事件不断增加。”“到1967年,边界关系已经变得很紧张。”这年1月,苏联媒体出现关于中苏乌苏里江冲突的报导。之后,中苏相互指责;苏联大量增加边防军,中国“为了作出反应”也重新部署力量。1968年1月末,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上又出现冲突。这类冲突事件持续下去,最后到1969年3月2日发生“珍宝岛事件”。<sup>③</sup>

## (二) 后冷战时期关于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起因的研究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学术界继续对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的起因进行探讨。

1. 从中国的角度而言,美国学术界的一些看法与冷战时期大致相同:

(1) 中国选择在1969年初即中共九大前夕与苏联发生流血冲突,是为了激发此时全国人民大众的热情,从而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抵抗来自苏联的长远威胁。托马斯·克里斯坦森指出:在毛泽东看来,“一场精心选定的与苏联冲突将会给高层党界创造紧迫感”,“这对在极其重要的中共九大期间或其后团结全党是有必要的”,不仅有助于团结全中国人民,而且“通过团结和动员他的社会来抵抗来自苏联的长远的威胁”。<sup>④</sup>

(2) “文化大革命”初期极左思潮造成的全国敌对苏联氛围,也促使毛泽东选择与苏联发生严重武装冲突。克里斯蒂安·奥斯特曼指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1966年,毛泽东中断与苏共的政党关系,将与莫斯科的交往降为低级别的接触。与此同时,边境地区的局势得到恶化。”小冲突在中苏和中蒙边境地区不断发生。从1964年到1969年,边界冲突事件达4189次。最终酿成珍宝岛武装冲突事件。<sup>⑤</sup>

<sup>①</sup>Thomas W. Robinson, The Sino-Soviet Border Dispute: Background, Development, and the March 1969 Clashe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ume 66, Number 4, December, 1972, pp.1195-1197.

<sup>②</sup>Thomas Robinson, China confronts the Soviet Union: Warfare and Diplomacy on China's Inner Asian Frontiers, in 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John K. Fairbank,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the People's Republic, 1966-198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250, p.263.

<sup>③</sup>Thomas Robinson, China confronts the Soviet Union: Warfare and Diplomacy on China's Inner Asian Frontiers, in 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John K. Fairbank,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the People's Republic, 1966-198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255-257.

<sup>④</sup>Thomas J. Christensen, Windows and War: Trend analysis and Beijing's Use of Force,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70-71.

<sup>⑤</sup>Christian F. Ostermann, East German Documents on the Border Conflict, 1969,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Issue 6/7, Winter, 1995, part 4, pp.186-187.

但与冷战时期相比,美国学术界对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的原因提出一些新看法。

其一,中国估计苏联此时不会因中国动武而立即对中国发动大规模进攻。所以,毛泽东决定冒此风险对苏联动武。莱尔·哥德斯泰恩指出:珍宝岛事件发生前,毛泽东仔细分析苏联可能出现的反应,认为苏联还没有为对华大规模战争作好充分准备。所以,“毛泽东愿意冒此风险”。珍宝岛事件发生后,周恩来仍然推测说:苏联最近不可能对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行动,因为其东部地区尚未开发,还没有为进攻行动建立起可靠的基地。<sup>①</sup>

其二,中国古代的孙子兵法对毛泽东发起珍宝岛战役产生影响。马克·布勒斯和阿布拉姆·舒斯克指出:中国古代孙子兵法中说“上兵伐谋”,即“挫败敌人的战略计谋”。此有助于毛泽东发起珍宝岛战役来打破苏联对华施加军事压力以迫使中国屈服的战略计谋。具体而言,“制造危机来打破敌人的平衡”,“挫败敌人的战略计谋”。“这可能是中国1969年3月2日在珍宝岛伏击苏联边防军的动机之一。”“中国可能认为,苏联的对策是逐渐地增大其在边境地区对中国的军事压力,直到中国愿意屈服于苏联的政治要求。”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可能决定有必要用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件来向苏联表明,中国“愿意冒战争危险”,而不愿意“在政治上逐渐失去回旋余地”。<sup>②</sup>

2.从苏联的角度而言,美国学术界有一些看法与冷战时期大致相同。如认为苏军侵入捷克斯洛伐克对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有一定的影响。泰勒·弗莱维尔指出: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后,“中国与苏联在珍宝岛上的对抗开始升级”。如1969年1月23日,开始在珍宝岛发生严重冲突事件,中国边防人员有28人负伤。中国越来越担心“苏联有可能对中国发动大规模战争”。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希望阻止这场战争”,并显示“中国不可欺”。所以,中国从1969年1月下旬就开始部署3月在珍宝岛进行武装行动,最终于3月2日发生了珍宝岛事件。<sup>③</sup>

3.从中苏两国的角度而言,美国学术界有一些看法与冷战时期大致相同。如认为珍宝岛事件是中苏边界长期冲突的继续。伽夫指出:珍宝岛事件前夕,中苏巡逻队在这一地区“越来越挑战对方”,“使用暴力逐渐升级”,甚至出现“交火”。“双方都不准备让步。”这样发展下去,“一场军事冲突将不可避免”。终于到1969年3月2日,在珍宝岛发生军事冲突。<sup>④</sup>

值得一提的是,2003年,即珍宝岛事件发生30多年后,权威学者托马斯·鲁宾逊重新对它进行研究,提出:珍宝岛事件不仅是中苏边界长期冲突的继续,而且是中国对苏联不断挑衅所进行的反击。他指出:从1968年年末起,珍宝岛成为中苏边界争端的焦点,事态越来越严重。如1968年12月27日,苏军出动装甲车登上珍宝岛,以棍棒和步枪殴打中国边防巡逻人员。1969年1月23日,双方再度在珍宝岛上发生冲突,中国军人约有28人被打伤。从2月6日到25日,珍宝岛又连续发生5起苏军拦截中国边防巡逻队事件。尤其是2月7日还发生了苏军鸣枪事件。这样继续下去,中苏之间在珍宝岛发生大的流血对抗“将不可避免”。也正是在苏联不断拦截中国巡逻队甚至向中国鸣枪的情况下,中国边防军才决定进行“自卫还击战”,“给苏联人一个教训”。这就出现3

<sup>①</sup>Lyle J. Goldstein, Research Report: Return to Zhenbao Island: Who Started Shooting and Why it Matters, *China Quarterly*, Number 168, December, 2001, p.992, p.994.

<sup>②</sup>Mark Burles and Abram N. Shulsky, *Patterns in China's Use of Force: Evidence from History and Doctrinal Writings*, Santa Monica, California: RAND, 2000, pp.19-20.

<sup>③</sup>M. Taylor Fravel, *The Long March to Peace: Explaining China's Settlement of Territorial Disputes*, Ph.D. Disser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2003, pp.294-295, p.298.

<sup>④</sup>John W. Garver,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1993, p.306.

月2日中国在珍宝岛“反击”苏军的事件。<sup>①</sup>

## 二、关于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过程的研究

### (一) 冷战时期关于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过程的研究

冷战时期,美国学术界掌握有关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的资料有限甚至有误。学者们将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的过程,简单地分成3月2日和3月15日的武装冲突。

#### 1. 关于3月2日武装冲突

费正清叙述得过于简单,指出:1969年3月2日,中国派“一个伏击分队”,在珍宝岛上同苏军“发生冲突”。“穿着白色制服”的中国边防军“一下子击溃苏联边防哨队”。之后,苏联“进行猛烈报复”。<sup>②</sup>托马斯·鲁宾逊则较详细地描述冲突的基本过程,指出:早在3月1日晚,约300名中国边防军越过乌苏里江冰面登上珍宝岛,在岛上丛林区挖猫耳洞,埋放直通对岸指挥所的电话线,在稻草堆里潜伏了一夜。2日上午11点左右,20至30名中国士兵从对岸来岛巡逻,与前来的苏联警戒部队发生舌战。之后,中国士兵对准苏军开火(笔者注:此处有误,应是苏军先开火,中国士兵自卫还击),打死包括上尉斯特列利尼科夫在内的苏军7人。附近早已潜伏一夜的300名中国军人也向苏军开火。接着中国士兵上来与苏军拼刺刀。中国当场打死多名苏军士兵。再接着,岛屿北部哨所的苏军赶来,混战开始,双方拼刺刀。最后,苏军牵制住中国士兵,迫使中国士兵退回(笔者注:此处有误,应为苏军受挫退回苏联境内)。<sup>③</sup>

#### 2. 关于3月15日武装冲突

托马斯·鲁宾逊也较详细地描述了这一天冲突的基本过程,指出:15日早上4时左右,早已潜行过来的苏军在岛上“动用较大的力量”攻击中国巡逻队。苏方配有装甲车,用机关枪阻止中国士兵前进,但被中方打退。此后,苏联炮火猛烈射击岛上中方阵地,并炮击中国境内纵深地区,在此掩护下,苏军以大量坦克、装甲车和装甲兵又登岛攻击中方阵地。苏军连续发动三次这样的进攻。前两次被中方打退,但第三次苏方打散了中方,中方退回自己的河岸(笔者注:此处有误,第三次仍然是中方打败了苏方,苏方退回自己的河岸)。此次冲突中,苏联死亡约60人,但中国也有伤亡。<sup>④</sup>此外,哈里·格尔曼也有类似的叙述。<sup>⑤</sup>

### (二) 后冷战时期关于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过程的研究

后冷战时期美国学术界对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的研究,与冷战时期相比,较为客观。学者们一般将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过程明确地分成冲突前阶段和冲突阶段,而冲突阶段包括3月2日、15日和17日这三日的武装冲突。学者们对武装冲突的情况做了更详细的考察和更符合实际的分析。

<sup>①</sup>Thomas Robinson, *The Sino-Soviet Border Conflicts of 1969: New Evidence Three Decades Later*, in Mark A. Ryan, David M. Finkelstein, and Michael A. McDevitt, eds.: *Chinese Warfighting: The PLA Experience since 1949*, New York: M.E. Sharpe, 2003, pp.207-208.

<sup>②</sup>John King Fairbank,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 New York: Perennial Library Harper & Row, 1987, p.332.

<sup>③</sup>Thomas Robinson, *China confronts the Soviet Union: Warfare and Diplomacy on China's Inner Asian Frontiers*, in 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John K. Fairbank,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the People's Republic, 1966-198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257-260.

<sup>④</sup>Thomas Robinson, *China confronts the Soviet Union: Warfare and Diplomacy on China's Inner Asian Frontiers*, in 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John K. Fairbank,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the People's Republic, 1966-198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260-261.

<sup>⑤</sup>Harry Gelman, *The Soviet Far East Buildup and Soviet Risk-Taking Against China*, Santa Monica, California: The Rand Corporation, 1982, p.32.

### 1. 关于冲突前阶段(1969年1月至2月)

托马斯·鲁宾逊叙述得最详细,指出:1968年末1969年初,苏联边防军多次出动装甲车登上珍宝岛,拦截殴打中国边防军人甚至向中国鸣枪,“发生大的流血对抗将不可避免”。鉴于此,中国方面下决心进行“自卫还击战”,“给苏联人一个教训”。1969年1月25日,中国黑龙江省军区制订了在珍宝岛地区“还击”苏军的方案。该方案设想,动用3个精干连参加该地区的战斗,以一部分兵力上岛潜伏。2月19日,总参谋部和外交部同意此方案。随着珍宝岛紧张局势的加剧,中共中央军委最终也同意此方案,并要求黑龙江省军区遵守“针锋相对、后发制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既不示弱,又不主动惹事”。沈阳军区决定由肖全夫副司令员指导战备工作。黑龙江省军区还在靠近珍宝岛的公司边防站成立“公司临时指挥所”。作战总原则是:自卫反击限制在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要行动迅速,不纠缠、不恋战,取得胜利后应撤至有利地区”。这样到2月末,中国方面对在珍宝岛进行“自卫战”做了详细的安排。<sup>①</sup>

### 2. 关于冲突阶段

#### (1) 关于3月2日武装冲突

托马斯·鲁宾逊指出:3月1日晚,已有两连中国边防军秘密上岛潜伏。3月2日上午8点40分,中国边防军30多人分成两组巡逻队,从正侧两面登岛巡逻。苏军发现中方第一巡逻队,立即出动70人左右,分乘2辆装甲车、1辆军用卡车和1辆指挥车,从苏联境内向珍宝岛急进,接近岛后,分成两队向中方第一巡逻队进逼。其中,斯特列利尼科夫上尉带领的苏军第一巡逻队很快遇上并拦截中方第一巡逻队。中方人员遂发出警告,但苏军置若罔闻。关键时刻,中方第二巡逻队从侧面出现。苏军第一巡逻队才发现中方有所准备,“恐慌起来”,朝着中方第一巡逻队“慌忙开枪”。此时是上午9点17分,苏军当场打死打伤中方人员6人。中方第一巡逻队立即“开枪还击”。珍宝岛武装冲突由此正式爆发。随后,中方第二巡逻队听到枪声也参战。岛上潜伏的中国边防军亦加入战斗。苏军2辆装甲车向这些中国边防军开火,遭到来自中国前线指挥部的炮击。此次武装冲突上午10点30分结束,持续1个多小时。在中方的打击下,约10名残余苏军退回苏联。中国估计苏军伤亡60余人。<sup>②</sup>帕特里克·单富良也有类似的叙述。<sup>③</sup>

#### (2) 关于3月15日武装冲突

托马斯·鲁宾逊指出:15日早上4点左右,苏军6辆装甲车掩护约60名步兵进入珍宝岛北端,潜伏在丛林中。早上7点40分,中国边防军上岛,8点2分与岛上潜伏的苏军交火。激战1个多小时后,苏军撤回对岸。上午9点46分,苏军动用3架飞机向珍宝岛地区俯冲进行威胁。然后出动4辆坦克从珍宝岛南侧攻击岛上中国军队,但被中方打败,逃回苏联。11点以后,中方又打退苏军第二次上岛攻击。12点50分,苏军炮火猛烈射击岛上中方防御阵地,并炮击中国境内纵深地区。在此掩护下,下午3点13分,苏军以大量坦克、装甲车和装甲兵又登岛,第三次攻击中方阵地。借助于炮兵,中方再一次打退苏军攻击。战斗在下午5点结束。苏军死亡约60人,但中方也

<sup>①</sup>Thomas Robinson, *The Sino-Soviet Border Conflicts of 1969: New Evidence Three Decades Later*, in Mark A. Ryan, David M. Finkelstein, and Michael A. McDevitt, eds.: *Chinese Warfighting: The PLA Experience since 1949*, New York: M. E. Sharpe, 2003, p. 207.

<sup>②</sup>Thomas Robinson, *The Sino-Soviet Border Conflicts of 1969: New Evidence Three Decades Later*, in Mark A. Ryan, David M. Finkelstein, and Michael A. McDevitt, eds.: *Chinese Warfighting: The PLA Experience since 1949*, New York: M. E. Sharpe, 2003, pp. 208-209.

<sup>③</sup>Patrick Fuliang Shan, *Damansky Island*, in Xiaobing Li, ed.: *China at War: an Encyclopedia*, Santa Barbara, California: ABC-CLIO, 2012, p. 101.



有伤亡。<sup>①</sup>克里斯蒂安·奥斯特曼也有类似的叙述。<sup>②</sup>

### (3) 关于3月17日武装冲突

托马斯·鲁宾逊指出:3月17日,苏军出动坦克5辆,步兵约70人,在炮火掩护下,大规模地登岛。苏军在岛上大量埋设防步兵地雷,并企图将上次在珍宝岛和中国江岸之间江汊上被炸毁履带的T-62型坦克拖回苏联。中国边防军则从中国江岸向上岛的苏军发射猛烈炮火。苏军被打退,并未能拖走坦克。稍后,苏军用炮火把该坦克下的冰层击破,该坦克沉入乌苏里江。5月2日,中方将该坦克打捞出来,后被送往北京中国军事博物馆展览。<sup>③</sup>帕特里克·单富良也有类似的叙述。<sup>④</sup>最后,托马斯·鲁宾逊总结说:在1969年3月珍宝岛武装冲突整个过程中,根据中国的说法,中国边防军毙伤苏军约260人(俄罗斯公布的苏军伤亡数为152人,其中死亡58人,负伤94人),毁伤苏军坦克、装甲车17辆。中国边防军伤亡也较严重。

<sup>⑤</sup>

## 三、关于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性质和影响的研究

### (一) 冷战时期关于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性质和影响的研究

#### 1. 冷战时期关于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性质的研究

此时期,美国学者往往采纳苏方的说法,认为是中国挑起这场武装冲突。托马斯·鲁宾逊当时在“完全缺乏可信的第一手资料”的前提下说道:珍宝岛武装冲突是中国“挑起”的。不过,中苏“双方均有责任”。因为,这场武装冲突是“中苏关系因其它原因开始恶化”才出现的,“文化大革命”与中苏边界局势紧张有关,但苏联对于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行为”做出“过分反应”,在其边境地区过度部署军力。<sup>⑥</sup>理查德·维奇也说道:是中国特地安排1969年3月2日对苏联的战斗。这次乌苏里冲突是中国因政治目的而挑起的,但又是“(中国)中央权威机构有计划却有所节制”的行动。<sup>⑦</sup>

#### 2. 冷战时期关于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影响的研究

##### (1) 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对中国的影响

影响之一是苏联开始对中国构成严重的军事威胁。威廉·惠特森和黄贞霞指出:“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中苏敌对越来越严重。中国认为,“苏联可能随时对中国发起惩罚性进攻”,所以,中国

<sup>①</sup>Thomas Robinson, *The Sino-Soviet Border Conflicts of 1969: New Evidence Three Decades Later*, in Mark A. Ryan, David M. Finkelstein, and Michael A. McDevitt, eds.: *Chinese Warfighting: The PLA Experience since 1949*, New York: M. E. Sharpe, 2003, pp. 211-212.

<sup>②</sup>Christian F. Ostermann, *East German Documents on the Border Conflict, 1969*,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Issue 6/7, Winter, 1995, part 4, p. 188.

<sup>③</sup>Thomas Robinson, *The Sino-Soviet Border Conflicts of 1969: New Evidence Three Decades Later*, in Mark A. Ryan, David M. Finkelstein, and Michael A. McDevitt, eds.: *Chinese Warfighting: The PLA Experience since 1949*, New York: M. E. Sharpe, 2003, pp. 212-213.

<sup>④</sup>Patrick Fuliang Shan, *Damansky Island*, in Xiaobing Li, ed.: *China at War: an Encyclopedia*, Santa Barbara, California: ABC-CLIO, 2012, p. 101.

<sup>⑤</sup>Thomas Robinson, *The Sino-Soviet Border Conflicts of 1969: New Evidence Three Decades Later*, in Mark A. Ryan, David M. Finkelstein, and Michael A. McDevitt, eds.: *Chinese Warfighting: The PLA Experience since 1949*, New York: M. E. Sharpe, 2003, p. 213.

<sup>⑥</sup>Thomas W. Robinson, *The Sino-Soviet Border Dispute: Background, Development, and the March 1969 Clashe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ume 66, Number 4, December, 1972, p. 1198, p. 1201.

<sup>⑦</sup>Richard Wich: *Sino-Soviet Crisis Politics: A Study of Political Change and Communication*, London: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0, p. 104, p. 271.



方面开始进行“战争动员”，“到1969年夏季，备战成为中国首要议题。”<sup>①</sup>

影响之二是促使中国开始改善与美国的关系。费正清指出：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发生后，“在以后一两年内，沿中苏边境的许多地方均发生事故。”这样，中国就“受到压力”。在“同苏联关系恶化”的背景下，中国开始与美国改善关系。1969年以后，中国同美国的关系“开始好转起来”。<sup>②</sup>

影响之三是国内“文化大革命”受干扰。托马斯·鲁宾逊指出：珍宝岛事件发生后，鉴于“苏军核势力威慑”，中国必须“加强自己的防务”。因此，“文化大革命”受到影响，如红卫兵的活动被“打断”，大批城市青年被送到北部和西部各省，组成新的生产建设兵团，并加强民兵建设，“开始建设大规模的城市防御体系”。<sup>③</sup>

## (2) 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对美国的影响

这种影响主要是使得美国开始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托马斯·鲁宾逊指出：珍宝岛武装冲突后，中国担心苏联的威胁和侵略，“从某种意义上调整”其对美国的立场，而这又有助于美国“恢复与中国的外交联系”。到1970年代前期，北京终于与美国进行和解。<sup>④</sup>

## (二) 后冷战时期关于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性质和影响的研究

### 1. 后冷战时期关于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性质的研究

此时期，经过重新研究，美国学术界普遍认为，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对中方来说，是“自卫还击战”。如前所述，托马斯·鲁宾逊在冷战结束后通过研究掌握的新资料认为，珍宝岛事件是中国对苏联不断挑衅所进行的反击。中国边防军当时进行一场“自卫还击战”，“给苏联人一个教训”。<sup>⑤</sup>托马斯·克里斯坦森也指出：珍宝岛事件是中国“动用武力来给苏联一个教训”，以显示中国努力维护其“安全利益”的“决心”。当时毛泽东担心“苏联可能进攻中国”。因此，就像在1962年对印度动武一样，“毛泽东运用武力来对付苏联”。<sup>⑥</sup>廉·伯尔亦指出：“毛泽东想运用武力来阻止苏联进一步侵犯中国。因此，北京于1969年3月2日在珍宝岛向苏军主动发起战斗。”<sup>⑦</sup>

### 2. 后冷战时期关于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影响的研究

此时期，美国学术界继续对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的影响进行探讨。

#### (1) 关于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对中国的影响

首先，美国学术界有一些看法与冷战时期大致相同：

第一，苏联开始对中国构成严重的军事威胁。陈兼指出：“珍宝岛事件立即将中苏推向全面战

<sup>①</sup>William W. Whitson and Zhenxia Huang, *The Chinese High Command: A History of Communist Military Politics, 1927-71*, New York: Praeger, 1973, pp.492-494, p.413, p.535.

<sup>②</sup>John King Fairbank,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 New York: Perennial Library Harper & Row, 1987, pp.331-332.

<sup>③</sup>Thomas Robinson, China confronts the Soviet Union: Warfare and Diplomacy on China's Inner Asian Frontiers, in 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John K. Fairbank,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the People's Republic, 1966-198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293, p.296.

<sup>④</sup>Thomas Robinson, China confronts the Soviet Union: Warfare and Diplomacy on China's Inner Asian Frontiers, in 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John K. Fairbank,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the People's Republic, 1966-198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291-292.

<sup>⑤</sup>Thomas Robinson, The Sino-Soviet Border Conflicts of 1969: New Evidence Three Decades Later, in Mark A. Ryan, David M. Finkelstein, and Michael A. McDevitt, eds.: *Chinese Warfighting: The PLA Experience since 1949*, New York: M.E. Sharpe, 2003, pp.207-208.

<sup>⑥</sup>Thomas J. Christensen, Windows and War: Trend analysis and Beijing's Use of Force,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69-70.

<sup>⑦</sup>William Burr,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69: The Sino-Soviet Border War and Steps towards Rapprochement, *Cold War History*, Volume 1, Number 3, April, 2001, p.80.

争的边缘。据报道说,苏联领导人甚至考虑对他们以前这个共产主义盟国实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sup>①</sup>翟强也指出:1969年的珍宝岛之战后,“中国领导人意识到,莫斯科对中国的严重威胁超过了华盛顿。”<sup>②</sup>

第二,中国开始改善同美国的关系以牵制和削弱苏联。陈兼和大卫·威尔逊指出: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发生后,“中苏关系陷入深刻危机”,“北京对美国的政策开始出现微妙的变化。”中国向美国发出了一系列希望与美国改善关系的“信号”,美国也开始调整其对华政策。所以,“三年后,尼克松访问中国,在北京与毛泽东面对面地见面。”出现中美和解的局面。<sup>③</sup> 马斯·克里斯坦森也指出:珍宝岛事件发生后,“对中国有一个好的结果”,即“加快与美国的和解”,使得“中国摆脱孤立的局面”。<sup>④</sup>

第三,国内“文化大革命”受影响。夏亚锋指出:珍宝岛事件发生后,“随着紧张局势的加剧”,“毛泽东和其同事被迫开始对中国外交和安全战略作重大改变”。“1969年4月中共九大后,文革最激进的时期宣告结束。”此后,中国一直在准备与苏联进行大对抗,包括“疏散城市人口”,“迁移大工业”。<sup>⑤</sup>

其次,后冷战时期美国学术界明显地出现新的看法。如认为珍宝岛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以后毛泽东“打开国门”和邓小平“大开国门”,即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傅高义指出“1969年中苏冲突以后,毛泽东率先打开国门。”后来邓小平在此基础上“使国门大开”,“接纳外国的思想、技术和资本”,“程度上大大地超过其前任”,从而“开启中国史上一个新时期”。<sup>⑥</sup>

## (2) 关于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对美国的影响

后冷战时期,美国学术界仍然认为,珍宝岛事件也有助于美国开始改善与中国的关系。陈兼和大卫·威尔逊指出:珍宝岛事件后,随着中国向美国发出一系列希望与美国改善关系的“信号”,美国也开始调整其对华政策。所以,3年后,出现中美和解的局面。<sup>⑦</sup>

这一时期,美国学术界在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对美国的影响问题上进一步做了深入的研究,认为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后,美国政府在谋求与中国和解以遏制苏联扩张方面经历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帕特里克·泰勒指出: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爆发后,尼克松政府起初考虑了所有的方案,如“美国默许苏联或与其合作攻打中国的核设施”;“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遏制苏联扩张;在中苏冲突中保持“中立”,等等。而尼克松政府更倾向于“联合苏联攻打中国”。因为,中国正处于“文革动乱”中,拥有大型核军火库,比苏联“更好斗”;同时,如果美国在中苏边界冲突问题上站在苏联方面,能够换来苏联放弃对北越的援助,美军就可体面地撤出越南。为此,美国甚至向苏联暗示可接受其对中国西北核设施进行核打击,彻底解除对中国不负责任地动用核武器的担忧。但是,随后苏联在中苏边界冲突过程中日益强硬起来,令冲突不断升级,美国政府开始怀疑苏联具有

①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p.240.

②Qiang Zhai, *China and the Vietnam Wars, 1950-1975*,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p.182.

③Chen Jian and David L. Wilson, All Under the Heaven is great Chaos: Beijing, the Sino-Soviet Border Clashes, and the Turn toward Sino-American Rapprochement, 1968-1969,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Issue 11, Winter, 1998, p.155.

④Thomas J. Christensen, Windows and War: Trend analysis and Beijing's Use of Force,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71

⑤Yafeng Xia, China's Elite Politics and Sino-American Rapprochement, January 1969-February 1972,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ume 8, Number 4, Fall, 2006, pp.6-7.

⑥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476.

⑦Chen Jian and David L. Wilson, All Under the Heaven is great Chaos: Beijing, the Sino-Soviet Border Clashes, and the Turn toward Sino-American Rapprochement, 1968-1969,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Issue 11, Winter, 1998, p.155.

控制远东地区的战略意图。面对美国的上述暗示和交易,苏联也一直没有回应,不愿或不能放弃其对河内的援助。大致到7月至8月,尼克松和基辛格才逐渐从既有的多种方案中选定“联中抑苏”方案,即“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遏制苏联扩张。<sup>①</sup>

### (3) 关于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对苏联的影响

冷战时期,美国学术界对此探讨极少。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学术界则加强此方面的研究,认为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对苏联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苏联与中国边境地区局势紧张。大卫·沃尔夫指出: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促使苏联与中国的对立“是名副其实的”,如冲突以后的几年中,在苏中边境地区出现“军队的集结和边境的紧张”,苏联政府对苏中边境地区苏联居民“进行宣传鼓动”,渲染中国的反苏政策,让当地“民兵熟悉武器并进行射击训练”,等等。<sup>②</sup>

其二,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苏联与美国的关系最终恶化。克里斯蒂安·奥斯特曼指出,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最后恶化了它与美国的关系”,“有助于推动中国与西方和解”。<sup>③</sup>

其三,在一定程度上推动苏联加强对汉学的研究。大卫·沃尔夫指出: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发生后,苏联“很快发现自己需要在远东地区为勘定边界提供专业人员”,为此进一步“动员学者们去进行历史研究”。如1969年4月28日,苏共中央要求有关部门在“1970—1975年”准备一项“关于中国问题的共同研究和出版计划”,“委托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协调全部科学研究活动”。通过这些汉学研究来影响苏联政府“观察中国”,有助于苏联决策者形成对中国和“中国问题”的观念。<sup>④</sup>

其四,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后来苏联在国内大力发展军工,从而影响了经济发展。唐耐心指出:“60年代中苏分裂公开化”,尤其是1969年发生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直接促使中美两国走向和解以共同对付苏联。苏联因而被迫“两线作战”,即既严防美国,又同时严防中国,为此在国内大力发展军工,并在中苏边境地区增加更多兵力,如1965年苏联在此地区部署15个师,1972年增加到44个师,到1982年又达到50个师,七分之一的苏联军事资源“用于推动远东扩张”。长期下去,“进一步削弱其经济”,“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基础设施恶化”。<sup>⑤</sup>

## 结束语

以上论述表明,冷战时期,美国学术界对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的起因、过程、性质和影响均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后冷战时期,美国学术界对这些问题进一步作了更全面深入的探讨,除了坚持冷战时期的一些看法之外,还提出一些新观点,或作一些新分析,表明后冷战时期美国在此课题的研究方面取得一些新进展。

自然,无论是冷战时期,还是后冷战时期,美国学术界对此研究还存在不足。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sup>①</sup>Patrick Tyler, *A Great Wall: Six Presidents and China, an Investigative History*,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1999, pp.50-89.

<sup>②</sup>[美]大卫·沃尔夫《中苏边界冲突:对亚洲冷战的新探讨》,http://www.usc.cuhk.edu.hk/PaperCollection/Details.aspx?id=3997,2016年5月1日。

<sup>③</sup>Christian F. Ostermann, *East German Documents on the Border Conflict, 1969*,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Issue 6/7, Winter, 1995, part 4, p.189

<sup>④</sup>[美]大卫·沃尔夫《中苏边界冲突:对亚洲冷战的新探讨》,http://www.usc.cuhk.edu.hk/PaperCollection/Details.aspx?id=3997,2016年5月1日。

<sup>⑤</sup>Nancy Bernkopf Tucker, *China as a Factor in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Empire*,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ume 110, Number 4, Winter, 1995, pp.502-518.

其一,有些叙述不大全面。如美国学者在叙述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时一般只注意到中苏于1969年3月2日、15日和17日这3天所发生的军事冲突。其实,3月2日至17日之间,双方还发生了其他一些小的武装冲突。如苏联边防军装甲车和武装人员于3月4日、5日、7日、10日、11日和12日一共6次侵入珍宝岛及西侧的中国河道上,而且在这段时间里,苏联直升飞机两次在珍宝岛上空飞行,甚至还在珍宝岛东侧中方境内降落。自然,苏军这一系列军事挑衅均被中国边防部队击退。但美国许多学者在叙述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时却对3月4日至12日的冲突有所忽视。更有甚者,有学者在论及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时只提及中苏3月2日和3月15日在珍宝岛所发生的武装冲突。如托马斯·鲁宾逊1972年撰文在论述“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时,就提到3月2日和15日中苏在珍宝岛上的武装冲突。<sup>①</sup>后冷战时期,陈兼在论及珍宝岛事件时也说中苏1969年3月在珍宝岛进行“两起流血冲突”。<sup>②</sup>显然,美国一些学者对于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过程的叙述并不全面。

其二,有些说法或观点不正确。如冷战时期,托马斯·鲁宾逊在分析“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的原因时说道:也有可能是林彪“为自己生存起见”,“铤而走险”,制造“1969年3月2日开枪”事件,当时,只有毛泽东和林彪才有“下令伏击苏联的动机和权力”,或许林彪认为,“国外的威胁能为军队继续执政提供帮助”,“能赋予其长期存在的机会”。<sup>③</sup>后冷战时期,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也说道“可以想象”,“林彪想用珍宝岛冲突来激发前线怒气,以给中共九大代表留下英雄的解放军是很重要的这样印象,以此为其在党内的自负角色提供根据。”<sup>④</sup>他们的这一说法缺乏史料依据,也不符合当时林彪的实际情况。因为,珍宝岛事件后,林彪“深信苏联会借机报复”,“对苏联发动大规模入侵的可能性估计较高”。<sup>⑤</sup>因此,事件前夕,林彪不大可能故意制造珍宝岛事件。况且,当时林彪不存在因其生存问题而“铤而走险”这种情况。事实上,珍宝岛事件后不久即1969年4月中共九大会议上,林彪的权力和地位达到顶峰,他被确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可见,美国学者的上述说法并不正确。

其三,有些问题还需作进一步探讨。如关于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的起因和细节及其对中苏美三国和世界的影响,等等,美国学术界还要作进一步的研究。

总之,尽管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但美国学术界在冷战时期尤其是后冷战时期毕竟对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作了许多深入的探讨,并形成一些相关成果。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这些成果有一定参考价值。

(责任编辑 宗成康)

<sup>①</sup>Thomas W. Robinson, The Sino-Soviet Border Dispute: Background, Development, and the March 1969 Clashe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ume 66, Number 4, December, 1972, p.1175.

<sup>②</sup>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p.240.

<sup>③</sup>Thomas Robinson, China confronts the Soviet Union: Warfare and Diplomacy on China's Inner Asian Frontiers, in 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John K. Fairbank,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the People's Republic, 1966-198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262-263.

<sup>④</sup>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Succession to Mao and the End of Maoism, 1969-82, in Roderick MacFarquhar, ed.: *The Politics of China: The Eras of Mao and De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263.

<sup>⑤</sup>杨奎松《1969:中苏战争即将爆发?——从珍宝岛事件到缓和和对美关系》,《党史研究资料》1997年第12期。